

困惑与彷徨

——论鲁迅小说对于知识分子启蒙的质疑与解读

常琳^{1,2}

(1.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2. 湖南农业大学 东方科技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五四以来,鲁迅以其先驱者的自居身份宣扬启蒙倡导革新,然而,“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本能地拉开了他与“启蒙对象”(庸众)的距离,同时,“知识分子群体”普遍的认知缺失也直接导致了启蒙任务在其手中的难以完成。“精英知识分子”依仗西方人文主义倡导下的启蒙意旨在“黑屋子”无人理解与接收的可悲状态中完成了一次自我演说,以鲁迅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也走向了迫不得已的困惑与彷徨。

[关键词]鲁迅;困惑;彷徨;知识分子;启蒙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6)06-0090-05

Perplexity and Hesitation: Question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Enlightenment of Luxun's Novels on Intellectuals

CHANG Lin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6, China;
2. College of Ori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May 4th Movement, Luxun had advocated innovation as a pioneer, however, there was still distance between the elite intellectuals and the objects of the enlighten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lack of cognition from common intellectuals directly resulted in the failure of enlightenment. In the sad state that there was no understanding and receiving of the “black room”, elite intellectuals, advocated by western humanism, had just finished a speech themselves. Then elite intellectuals represented by Luxun had to face the perplexity and hesitation in the real world.

Key words: Luxun; perplexity; hesitation; intellectuals; enlightenment

1918 年鲁迅在《新青年》第 4 卷第 5 号发表了《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开辟了我国小说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1918 年至 1922 年鲁迅连续发表 15 篇小说,于 1923 年 8 月编为短篇小说集《呐喊》,1924 年至 1925 年其所作小说共 11 篇,收入 1926 年 8 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彷徨》。两部小说集共 26 篇小说,然而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就占有 15 篇,毫无疑问,作为“个体知识分子”的鲁迅在进

行自我言说的同时,也在表达对于同类“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和期盼,以往的学界研究大多也将鲁迅视为时代知识分子的“领头主将”,极力肯定其作为知识分子的“马首”作用,倡导“万千知识分子更应该将鲁迅作为时代的楷模,用鲁迅精神照耀他们的前进,积极投身抗战的洪流中,赶走侵略者。”^[1]于是,在以“种群”为概念的“人”的所属范畴中,鲁迅自动地分离了“知识分子群体”和“庸众群体”,完成了“启蒙主体”和“启蒙对象”的身份划分。将

收稿日期: 2016-10-09
作者简介: 常琳(1978-),女,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湖南农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进行群体划分,并以此观照鲁迅思想启蒙的研究在当今学界已有涉及。如:宋剑华的《“在酒楼上的”“孤独者”——论鲁迅对“庸众”与“精英”的理性批判》^{[2]4-14},魏巍的《知识分子如何启蒙?——〈阿Q正传〉再解读》^{[3]7-14},张冀的《论鲁迅之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反讽意义》^{[4]89-101}等。本文试图以“种群”划分为研究切入点,以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群体为研究对象,在对“知识分子群体”和“庸众群体”的二元分化、“精英知识分子”与“普通知识分子”的认知距离和沟通缺失探求中观照和解读鲁迅的启蒙思想,为鲁迅“五四”后走向启蒙的困惑和彷徨提供注解。

一 定位与认同:知识分子的身份确认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知识分子论》一书中谈到:“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5]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士(知识分子)始终占据着社会结构的中心位置,统治和管理着社会的中心事宜,其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毋庸置疑。“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不懂技术的。他们的垄断权是建立在历史智慧、文学消遣,以及表现自身的艺术才能的基础之上的。”^[6]无独有偶,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启蒙”言论正为他确立“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地位做了最佳的诠释。“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7]在鲁迅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有“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才能创造出“真的新文艺”,才能使文学真正成为“为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8]241}借助文字书写,表达其社会抱负和精神旨归成为鲁迅自身知识分子身份定位的基准,“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8]417}同时期鲁迅的大量创作,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着其对于“知识分子群体”使命与职责的书写。

鲁迅对于知识分子的认知深受爱罗先珂的影响,爱罗先珂曾在一次题为《智识阶级的使命》演讲中,强调智识阶级要主动和广大民众结合,否则就要退化为书呆子,退化为孔雀、鹦鹉,甚至蜕变为更

坏的东西。他称赞俄国知识分子自觉走向民间启蒙民众的奉献精神 and 自我牺牲精神。他说,知识分子要引导民众从黑暗中走向光明,要有伟大的牺牲精神,才能战胜各种困难艰险,正是这种牺牲精神才促成俄国革命的成功。显然,其知识分子观对于鲁迅其后的“知识分子群体”身份定位和启蒙言说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杂文中,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解读。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9]190}“真的知识阶级”首先要有独立的个性。唯有精神独立,才能看到社会与权力者的缺点,才能不顾利害地发言。“真的知识阶级”要拒绝为奴,保持自己的精神独立,必须对抗权力。因为知识和强有力总是冲突的。要做一个真的知识阶级,必须保持个性独立,做自主的个人,就不能放弃对任何权力的反抗。真的知识阶级,不仅要保持个体的独立自由,绝不会“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必须接近底层民众,“感受平民的苦痛”,为平民说话,才能体现真的知识阶级的人生价值。这是鲁迅从知识分子群体中自我放逐之后所做出的自我选择与价值定位。

从鲁迅关于知识分子的言论中,我们不难认识到鲁迅的知识分子观:一是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是两个彼此独立的群体;二是知识分子有着高于普通民众的社会地位,启蒙普通民众的社会职责。《故乡》中“迅哥儿”与“老爷”的称呼隔阂,与其说是两者身份与意识上“变”与“不变”的吊诡,更是“庸众”与“知识分子”对立身份的言语呈现。“真的知识阶级”“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9]191}不从众,不媚俗,不惧于众势,不淹没于民间,与大众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真的知识阶级”应有的特质。“知识阶级”与“庸众群体”的身份划分,将“庸众”视为是“传统文化的负载对象,而‘精英’又自诩是‘西化’现代性的当然代表”,^{[2]4}鲁迅从言论和事实上再次将自我身份进行了明确定位,也开启了其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

二 意义与使命:知识分子的启蒙书写

从鲁迅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如《狂人日记》

《孔乙己》《伤逝》《白光》《在酒楼上》《孤独者》《端午节》《长明灯》,我们发现,作者精心为我们设计了三种社会角色完全不同的文化群体:一是代表都市启蒙阶层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如狂人、夏瑜、陈士成、吕纬甫、魏连殳等,鲁迅对他们寄予了厚望,将其纳入自身所处“知识分子”群体,试图以有效的话语言说唤醒“庸众”的顽愚与落后;二是代表封建统治阶层人格依附形象的权力群体,如《狂人日记》中的大哥、《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孔乙己》中的掌柜、《祝福》中的鲁四老爷、《伤逝》中子君的叔父和《孤独者》中的家族宗亲等,他们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和封建权力的执行者,权力群体以他们的绝对坚守坚持着封建话语的主导权和封建地位的捍卫权;三是代表封建思想深刻浸染人格缺失形象的庸众群体,如《狂人日记》中狼子村的佃户们、《阿Q正传》中的阿Q、《祝福》中的祥林嫂、《孔乙己》中的酒客们等,他们是封建思想道德和意识不自觉的坚守者,生存空间的闭塞、自我意识的缺失使得他们麻木自觉地接受着“从来就如此”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

显然,知识分子群体、权力群体和庸众群体以他们相异的意识形态共处于相同的空间环境中,知识分子群体具有“启蒙”言说的动力和意旨,封建思想坚守者和执行者(包括权力群体和庸众群体)成为其启蒙目标和对象,然而,权力群体的绝对统治地位和强大的主导欲望,否定并且扼杀“启蒙”的霸道行径成为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药》中以康大叔为代表的“刽子手”痛快淋漓的结束了革命者夏瑜的生命,并将代表精气的“人血馒头”作为交易物卖给华老栓无疑就是这一精神扼杀的外在呈现。庸众群体“被启蒙”而不得,华老栓一家视革命者夏瑜的鲜血为生命再造的希望,“启蒙”主体的言说意旨随着“人血馒头”的消失,“白气散了”“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而消解。(小说《药》以“人血馒头”这一物质符号为中心,叙述着启蒙主体(夏瑜)、权力群体(康大叔)和庸众群体(华老栓)三种力量之间的悬殊与对抗。启蒙主体(夏瑜)的革命目的在于解救如华老栓们愚昧落后的庸众群体,然而,他们的革命最终却被权利群体(康大叔)扼杀,启蒙主体的势单力薄和难成气候现实清晰可见,更为可悲的是,启蒙主体(夏瑜)的“血”最终成为华老栓们用以疗治生理疾病的生命之药。“血,乃精气也。”一个可悲的事实:杀掉启蒙主体(夏瑜)肉体的是强大

的权力群体(康大叔),真正扼杀启蒙主体(夏瑜)精神的仍是以华老栓们为代表的“庸众群体”。“庸众群体”启蒙理念的无法接受,“启蒙主体”启蒙话语的无效存在,《药》的故事叙述成为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体”后期走向启蒙困惑事实的文本注释。)在这三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启蒙者从数量上来看显然只占有极为少数的部分。他们虽然具有启蒙意识和话语权力,但是面对掌握统治权力的权力群体和尊崇封建思想的庸众群体,启蒙话语走向无效状态。而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茫然与不清醒,也为欲启蒙而不得的轰轰烈烈的启蒙行动写下注脚。

纵观鲁迅作品中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其笔下的知识分子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封建制度的卫道士。《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是此类代表。他们接受封建教育,维护封建道德,死守封建陈规,漠视下层劳动人民疾苦。鲁四老爷在祥林嫂死时“可见是一个谬种”的痛恨评价,足见其对于他人苦难的无情。二是深受封建制度毒害的落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接受过新式文化教育,能够并且愿意反抗封建旧道德,如《端午节》中的方玄绰,《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子君、涓生等。三是肩负启蒙使命的先驱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先驱者的身份使其承载了“启蒙”的历史任务,大胆的冲破旧式牢笼,勇敢的进行启蒙革命,然而,终无法逃脱牺牲的必然命运。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命运的难以把持和对于未来的认知茫然,启蒙在他们“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湮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筌篴了”。^[10]年轻时意气风发的吕纬甫,再次见时“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了,“精神很沉寂,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彩”,问及过往,“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谈及未来,“只要模模胡胡,模模胡胡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最终回到以教《诗经》《孟子》《女儿经》谋生,“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是随随便便……”^{[11]244}魏连殳“躬行与先前所憎恶的”,然而“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11]96},以自我精神的扭曲与毁灭为代价来寻求自我的生命价值;大胆追求个体独立和自我幸福的

子君,最后也在鲁迅“不是堕落,就是回来”^{[8]159}出走设定中回归家庭牢笼,抑郁而终;陈士成也以“作作也证明是生前的落水”的结局宣告他的最终选择,尽管“因为他确凿曾在水底里挣命,所以十个指甲里都满嵌着河底泥”。^{[8]542}

知识分子无独有偶的终止追求、回归现实、寻求自我的终极选择,是知识分子群体启蒙书写的集体诉求,亦是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启蒙行径最终迫不得已的精神规避。“鲁迅对以土、洋知识分子为中心掀起及掌控的未庄‘革命’的表述,表明了他批判的对象并不仅仅只是阿Q这样的愚昧民众,他同时也指向了那些掌控着话语权的知识分子。”^{[3]13}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对不对——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到处乱闯。”^[12]肩负着启蒙使命与职责的知识分子群体以其自身的无所适从完成了一次神圣的知识分子启蒙书写,然而,关于启蒙的思考和启蒙之后的何去何从始终成为学界的关注所在。

三 困惑与彷徨:知识分子的启蒙困境

1927年鲁迅在黄埔军校的演讲时一再强调:“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最好不过作一篇战歌,或者写得美的,便可于战余休憩时看看,倒也有趣”,“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13]417}这是鲁迅告别思想启蒙后精神归宿的重新定位与选择。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历经短暂的十年时间,在精英知识分子“尚武”精神的推崇中走向消亡与转折。

理性地分析这场运动,无疑,我们不可忽视鲁迅的“启蒙”概念设定与“启蒙主体”和“启蒙对象”的群体身份界定。阅读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其“知识分子群体”的概念种属中,将其划分为“精英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两类,鲁迅视己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举旗人物,启蒙“普通知识分子”和“庸众群体”实现种群的集体清醒状态成为其义务与职责。青年鲁迅“人为的将‘精英’从‘庸众’群体中剥离出来,并试图通过呼唤‘精神屈之战士’的闪亮登场,进而使‘以愚民为本’的‘沙聚之邦’,转变为‘屹然独见于天下’的

‘人国’”。^{[2]5}溯源启蒙一词,我们可以从西方不同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论述中追溯根源。主张超人哲学的尼采在他绝大多数的文章中,始终在强调“个人”与“他者”精神意志的平等性;推崇反传统、反理性的理性批判精神的康德则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14]542}在康德看来,启蒙就是要求每个个体都为自己而思考,而不是消极地接受他人的命令或者服从权威;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则认为“我们从我思中发现的并不仅仅是我自己,也发现别人。……思考个人与个人的种种关系,这样我们才能把它叫作一种人道主义。”^[15]认真而平等地思考每个个体存在的价值,实现每个个体自我认知后的自我启蒙与觉醒。恩格斯则这样描述启蒙主义:“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怎样的。宗教、自然、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14]379}否定权威与特权,尊重平等与人权被视为启蒙主义的内在和宗旨。纵观西方的“启蒙”探讨,我们不难得出:一是启蒙强调人的个体性,强调每个个体的意识觉醒;二是启蒙的主体是每一个个体,不存在绝对的启蒙权威和启蒙主体;三是启蒙尊重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绝对平等,关注普遍人性和权利的表达。再次审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运动,“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与“启蒙对象”的身份对立,与“普通知识分子”群体的认知距离,“庸众群体”的麻木与愚昧,启蒙主体绝对主导的启蒙姿态,实用科学理性的启蒙误读,最终导致“五四”启蒙走向偏至和回归。“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启蒙主义言说和文学革命的倡导终究只是圈内文化人的自说自话,并没能马上发挥出实际的社会功效,鲁迅张扬启蒙却又深感启蒙无效即是明证。”^[16]

“五四”启蒙后期,“知识分子群体”最终难逃现实社会残酷虐杀的悲剧命运、难挡封建道德浸染的精神回归,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以鲁迅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与“普通知识分子”群体的距离和隔阂,“普通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思想局限使其难以担当启蒙重任,“启蒙”于他类而言也成为一种必

然,以鲁迅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视眼中的“启蒙主体”转化为“启蒙对象”,本来为数不多的“启蒙主体”变得越发势单力薄。鲁迅终于也认识到“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群体”走向绝望和回归的悲剧结局,更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对于自身启蒙处境的真实体认。他们清醒认识到仅仅依靠自身“呐喊”难以引起“启蒙对象”的觉醒和附和,“启蒙话语”背后“普通知识分子”群体尚且无动于衷,更何况愚昧落后的“庸众”。“启蒙对象”的缺席和“启蒙话语”的无所接受,使得“启蒙主体”的启蒙指向走向空洞和无效,启蒙意旨失去了它本该有的效力和价值,正如后期鲁迅在《答有恒先生》所说:“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13]474}面对“启蒙主体”启蒙话语的无效性,“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软弱性以及“启蒙对象”的愚昧盲目性,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走向尴尬的言说困境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参考文献:

- [1] 康桂英.延安时期何干之对鲁迅思想的研究[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6(4):14.
- [2] 宋剑华.“在酒楼上”的“孤独者”:论鲁迅对“庸众”与

“精英”的理性批判[J].鲁迅研究月刊,2016(1).

- [3] 魏巍.知识分子如何启蒙?——《阿Q正传》再解读[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 [4] 张冀.论鲁迅之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反讽意义[J].文艺争鸣,2015(11):89-101
- [5]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164.
- [6] 费孝通.中国绅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42.
- [7]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2.
- [8]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9] 鲁迅.关于知识阶级[M]//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10]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M]//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4.
- [11]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12] 鲁迅.两地书:第1集[M]//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
- [13]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14] 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15]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68.
- [16] 张冀.错误的对接:论实用科学理性与五四新文学的理论构建[J].广东社会科学,2011(6):178.

责任编辑:黄声波